



上了年紀的人，常能收獲好聽的話，小朋友會叫你「爺爺」，大朋友會稱你為「老人家」。白髮是一種包裝，它有兩重性，能讓你得到意想不到的尊重，但也常常令可貴的忠告望而卻步，特別在你犯傻的時候。

不久前參加同學會，見一向身體硬朗的T同學像換了個人似的，一副大病過後的模樣。一問緣由，才知道他正忙著給自己的新房子裝修。如此情景讓C同學生出感想來，他向在場的同學轉達了梁實秋多年前就提出的人生忠告：你要想一天不得安寧，就請客；要想一年不得安寧，就蓋屋；要想一輩子不得安寧，就去討姨太太。說實話，參加同學會，我最感興趣的，就是能聽到只有老同學才願意講的大實話。

有一次，在一塊文學園地裡，讀到一位文學編輯給文學愛好者講的逆耳之言。他的話有些「另類」，所以給人的印象深刻。他不是誇耀文學如何如何好，而是要別人對文學保持警惕。他講，找他幫忙的文學愛好者，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年輕的，也有年長的，要求各有不同，有希望幫着看文稿的，有希望他出謀劃策的，甚至有希望他能幫忙實現一些諸如發表、出版等目標的。開初，他碰到這些事，常有飄飄然的感觉，總認為別人在仰視自己，崇拜自己，求助自己。可是，當他安靜下來思考的時候，才發現，這並不是一件好玩而能夠輕率的事情。因為文學是有一定毒性的。或者說，文學就是一副藥，可以療傷治病，修身養性，但是，是藥三分毒。

他講了幾件自己親歷的事，說明自己看法的由來，有兩個故事至今我還記得清楚。

曾經有一位年輕的女孩，痴迷文學，按照其說法，是報紙讀她和編輯結了緣。她打聽到編輯的電話號碼，頻頻給他打電話，和他切磋商作。後來編輯有了異樣的感覺。有一天，她終於向編輯表達出了愛慕之情，甚至跑很遠的路去找他，給他送來親手剝了殼的核桃。編輯告訴她說我們兩人交往僅限於文學，自己已經有了女朋友，並且申明馬上就要結婚了。可女青年居然引用編輯一篇文章中的話說「愛要大聲說出來」，你有女朋友，我不在乎。編輯無奈，只好落荒而逃。後來女青年居然把電話打進編輯的家裡來，並且還向他的女朋友（後來的妻子）打電話。編輯非常憤怒，毫不留情地一通痛斥，事情才算收場。從那件事上，編輯第一次感覺到，文學愛好，居然會有如此大殺傷力！文學危險，注意安全！

另外有一位文學愛好者，大概有着一些曲折的人生經歷，吞飲過一些人間的委屈和苦悶，於是決心出一本書。他找到編輯，請他幫忙。編輯認真讀了書稿，以為實在沒有什麼特色，難得出版。但在作者看來，這本書卻如此重要，以至於他要用自費的方式出版，便託編輯打聽自費出版的費用。編輯給他諮詢了，很貴。但作者說他一定要將書出版，越有檔次的出版社越好，越有影響力的越好，而出版費用，他可以去貸款。天吶！於是編輯又一次感受到了文學的瘋狂性。一本書，真的就可以改變一切嗎？也許可以，但是太難了。編輯以為，與其耗盡甚至透支財力和精力去出版一本並不會改變什麼的書，倒不如全心全意做些實際的事情。

這位編輯關於文學具有毒性的說法，雖值得商榷，但他以親身經歷來告誡文學愛好者千萬別把文學拔得太高，錯把自己和別人統統當成文學中人，這應當是忠告。

不可替代的細膩

說到文字的細膩和表達的精確，讓人想到一例。著名作家孫犁的散文《荷花淀——白洋淀紀事之二》，是中國現代文學廣為人知的散文之一，在很長時間裡一直是內地中學課本裡的讀物。在孫犁的筆下，抗日戰爭的腥風血雨被白洋淀的汪洋大水蕩漾得淡淡的，寡寡的，如同窮苦人艱難的日子。日本鬼子來了，日子沒法過下去了，村裡的小伙子們要到白洋淀裡打日本鬼子。男人們去了，女人留在村子裡。「女人們到底有些藕斷絲連」。審稿的編輯把「藕斷絲連」改成了



文化什錦

「牽腸掛肚」。但是，孫犁堅持改不得，一改味道就全變了，快快改回來。編輯認為，改得，寫女人心事，「牽腸掛肚」才是常規。作者說，常規不常規我不懂，我只知道這裡只能用「藕斷絲連」。據說，出版社方面都認為「牽腸掛肚」在這種語境裡更合適，此護了編輯。孫犁一貫為人溫厚，生性散淡，但是這次他表示憤慨，上書有關方面，要求出版社必須改回來。後來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白洋淀紀事》一書裡，保留了「藕斷絲連」，無疑是孫犁在這場筆墨官司中獲勝。

確實，「牽腸掛肚」用在女人對丈夫的關心上，是很貼切，但是它給讀者想像的可能性就要少得多。作者用了「藕斷絲連」來敘述青年男女的分離，這樣的表達的可能性則要大許多。人家過得好好的，突然就必須分開了，斷開了，用「藕斷」來形容，既新穎也貼切。兩口子不得不斷開，可是心思和感情還連着，像「絲連」一樣，形象生動。還有，「藕斷」還有「偶斷斷」之意，暗示小伙子們突然離去，只是臨時的，打完仗，很快就會回來。「絲連」則更有寓意：見過藕斷開的人都知道，那些絲不只一根，而是許多根，多不勝數。這種「絲連」是多極的，多線的，複雜的。再者，「絲連」還能諧音「思念」。當然，聰明的讀者，還能從「藕斷絲連」中想像出更多的意味。所以，孫犁堅持的是不可替代的細膩。

尊孔·批孔·識孔

做「既從眾而批之，亦從眾而妖之」，這種「批孔」與「獨尊儒術」之「尊孔」似乎水火不容，在思想方法上，卻是異曲同工，殊途同歸。例如，無語是王充，還是李贄，以及荀子、王安石、直至章太炎，在對孔子及儒家文化之被戴上與孔子以及儒家對立的「法家」之桂冠。恰恰從另一角度體現了當時人們對孔子及其儒學缺乏最起碼的認識。

「批孔」之得失應當使人明白，「尊孔」也好，「批孔」也罷，都立足於「識孔」。只有弄懂孔子及其儒學到底是怎麼回事，方能尊其所當尊，批其所當批。孔子作為歷史文化名人，有其人格魅力，也有其人性弱點。孔子對中國兩千多年歷史之影響，有負其人之名。所以，對於孔子及其儒學，有尊有批，有真之真，有偽之偽，都是不可取的。既得一錢不值，都是不可取的。

如今的一國學熱，其核心乃是孔子熱。祭孔規格不斷升級，尊孔調門日見高漲，不但有人提出中國必須「回到儒家去」，而且也有人說，中國今後二千年的思想學術、文化創新，也得在孔子傳授的「六經」指導下進行。如此「尊孔」，竊以為並不可取。「歷史真像古老自鳴鐘的單調，向左擺過去多少度，向右也得擺多少度」，這就是說，無論過去多少度，胸無定識，方才容易左右搖擺，好走極端。

香港作家黃崖

許定銘



書亭

大部分作家辭典和文學辭典都把黃崖（一九二二至一九九二）歸納為馬來西亞小說家，並說他一九五〇年代到馬來西亞任文藝雜誌《蕉風》的編輯，其後主編《學生週報》，主持新線出版社及《星報》，指導並扶掖年輕人編《新潮》、《荒原》、《海天》等文學刊物，為當地文化事業作出貢獻……其實，黃崖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初，已在香港加入友聯出版社，任《大學生活》和《中國學生週報》要職，並開展其創作生涯，赴馬來西亞前，已出版過小說集多種。即使後來離開了香港，他的小說仍多由香港高原出版社出版，把他稱為「香港作家」一點也不為過。

黃崖在香港出版的小說超過十種，有趣的是坊間卻甚少見。我有幸在舊書拍賣會上搶得的這冊《草原的春天》（香港友聯出版社，一九五七），全書約九萬字，收《秋葉》、《儒夫》、《殺人犯》、《鳳凰崗》、《狂風暴雨》等八個短篇，是他的第二本小說集。作為書名的《草原的春天》，是書中較長的一篇，作者用兩萬多字寫蒙古漠南兩個世仇民族，因愛情而得以和解的故事。黃崖特別愛此篇用書名，不過，我則覺得它太「羅密歐與朱麗葉」了。同樣寫愛情，《儒夫》中的女主人翁，最後自盡，執著的典型性格和《編蝠》中在現實社會上不擇手段混飯吃的陳博士，都刻畫得較深入。

流動空間

今屆倫敦奧運會很有特色，除了開幕式導演鮑爾的「綠色和愜意」之外，還充滿了「綠色的醋意」。不過，把「英國田園」變成「酸葡萄園」的不是鮑爾，而是英國傳媒。從伊麗莎白二世與「〇〇七」跳下直升機的那一刻，英國傳媒就把槍口對準了一個個有機會贏得奧運金牌的中國運動員。看看英傳媒關於中國奧運代表隊的報道，似乎這不是一場中國運動員與其他國家運動員之間的體育競賽，而是英傳媒針對中國運動員的一場不對稱的「拳擊」。

英傳媒把自己打扮成奧運賽場上的「無冕警察」，並先入為主地認定中國隊有作奸犯科的嫌疑。他們對中國運動員的報道充斥著醋意和惡意。第一個被他們以「莫須有」定罪的是葉詩文。當這位十六歲的中國姑娘刷新世界游泳紀錄，獲得金牌的時候，英國媒體幾乎都拒絕接受中國人獲勝的事實，並以為這是抓住中國人作弊的好機會。在藥檢結果尚未公布之前，他們已急不可待地把葉詩文推上了被告席。當藥檢證明她的清白之後，英傳媒連平時掛在嘴邊的「sorry」也來不及說，又調頭攻擊中國把運動員「當成機器一樣訓練」，並酸溜溜地說：「即使贏得一枚金牌都不值得如此代價的訓練。」

英傳媒在今屆奧運會上也打破了一項「記錄」——打破了他們是公平和公正的神話。當英國男子自行車隊故意摔車，博得重賽而獲得金牌時，英傳媒只有一面倒的喝彩，但對於中國羽毛球隊的戰術

性消極打法，卻大加鞭撻。當中國十六歲小將把游泳紀錄縮短六秒時，英傳媒立即提出質疑，嘴巴比刀子還鋒利，但是當美國十五歲小將把游泳紀錄縮短十五秒時，英傳媒卻像吃掉了自己的舌頭。當中國隊奪冠時，英傳媒用《中國運動員是機器零件》作題目，但當英國隊獲得金牌時，便說「主要依靠運動員的勤奮、天才和努力」。英國廣播公司（BBC）也不得不承認英傳媒的報道「似乎存在雙重標準」。

好在英國並非沒有清醒的人。前《泰晤士報》總編輯詹金斯爵士（Simon Jenkins）在《衛報》的特約專欄一針見血地指出：英媒體之所以動輒對中國運動員文誅筆伐，或許是因為英國奧運代表團這次表現不佳，而產生「酸葡萄心理」。當英傳媒鋪天蓋地聲討中韓羽毛球隊「造假」時，他站出來說：「對中韓運動員的指責有失公允……每個國家一提到奧運都會把獎牌與國家榮譽聯繫在一起。因此單單批評中國和韓國人有錦標主義實在虛偽。」幸好英國隊在後來的賽事上獲得好成績，才使得英傳媒有正事兒幹。事實上，英傳媒在本國運動員獲得獎牌時所表現出來的錦標主義和狂熱的民族主義，比其他國家有過之無不及。

英傳媒的表現讓我想起一段往事。一九九二年奧運會在巴塞羅那舉行。那時我正在英國留學，本以為能在電視機旁為中國隊加油，但英國電視台根本不轉播中國運動員的比賽情況。英國在自行車比賽的一個項目上獲得了冠軍，從此之後，電視台每天播放奧運節目的片頭就是那輛自行車在那兒轉來轉去，而且反過來掉過去地播播，重播，好像奧運會的比賽項目就是自行車。在電視上，當提到中國

隊，「宜細不宜粗」，其全部目的就為了逼近真相，揭示真相。這就必然要高舉批判性思維的大旗。汪洋說：「我們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此語一出，很多人感覺石破天驚。其實，汪洋只是說了個大話而已。人民是執政黨的衣食父母，這是天下常識。之所以今天有石破天驚之感，關鍵是長期以來的極「左」宣傳和愚化教育所致。如今，需要用批判性思維對待的東西太多了，民主不需要「特色」，市場不分姓社姓資，愛國是否就是一直投資成票，世界有沒有普世價值……真是難題。

批判性思維是到達真理彼岸的橋和船，是通向真相的曲折的路。它擁抱的是光明，追奔的是公平。它以社會批判為己任，企圖讓一切假惡醜的東西暴露於天日之下，又企圖讓真善美的金光在人間熠熠生輝。批判性思維是有立場的，在雞蛋和石頭之間，它選擇的永遠是雞蛋。故而權勢、「家長制」、「一言堂」、壟斷者、特權集團、達官貴人、專制獨裁者，視為大敵。原因很簡單，因為批判思維的最終結果，會剝去他們身上的畫皮，攪動他們貪腐和掠奪的根基，最終掀翻他們長期享受的「肉肉宴席」。因此，那些權傾一時的「土皇帝」，最恨批判性思維。僵化的體制恨它，強勢恨它，特權恨它，豈止是恨，而是要扼殺它。人人都懂批判性思維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十分重要，但真要讓它在現實中揚眉吐氣，如魚得水，恐怕要打掉無數「攔路虎」才行，非一場革命式的變革不可。

酸溜溜的倫敦奧運會

方元

英國人的酸溜溜，我可以理解，但不能理解的是，香港和內地的一些媒體也在那兒說中國運動員「機器人」長、「機器人」短。他們不覺得自己是重復西方傳媒聲音的「機器人」嗎？有位北京的記者因孫楊和葉詩文對傳媒時不如美國運動員成熟，便上網標題說：「如果運動機器成為中國運動員的代名詞，那麼優異的成績究竟會是中國競技體育的榮耀還是諷刺？」這位記者大概忘了，孫楊和葉詩文的專業是游泳，不是「公關」，他們去倫敦的目的是參加奧運會，是去與美國人比游泳。這位記者還忘了，中國人送他去倫敦是為了給中國隊加油，不是讓他在金牌裡面挑骨頭。當五星紅旗在倫敦比賽場上升起來的時候，這位記者不為中國運動員的優異成績感到榮耀嗎？對於香港和內地這些「酸葡萄」，我想借用倫敦市長約翰遜的一句話：「閉嘴！雜音夠多了！這些口水不如用來聲援自己國家的奧運代表隊！」

在今屆奧運會上，英傳媒堪稱最缺乏奧林匹克精神。作為東道主，他們不但未盡地主之誼，而且有失待客之道。他們對本國運動員只讚不彈，對中國運動員卻百般挖苦，使用「丟人」、「無恥」等極端刻薄的字眼。英國廣播公司也承認：「英國的報紙、電視和廣播在英國奧運隊表現不盡人意時，幾乎成為討伐中國人作弊的輿論戰場。」現在奧運會已接近了尾聲，「葡萄」也該成熟了吧。作為一個曾在英國留學和工作，對英國有好印象的中國人，我希望英國傳媒拿出一點「紳士風度」，在奧運會餘下的時間裡，讓中國人和世界各國看到盎格魯人並非狹隘的民族主義者，而是具有大國胸懷的人民。

羅浮山是道教十大洞天之第七洞天，七十二福地之第三十四福地，擁有九觀十八寺二十八庵，四百三十二座大小峰巒，九百八十多處飛瀑流泉，七十二個石洞山房。羅浮山得名頗為傳奇，相傳古時只有羅山，後浮山從東海浮來，以鐵橋峰與羅山相連。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東晉道教學者、著名煉丹家、醫學家葛洪就曾在羅浮山上煉丹修道，而在香港廣為人知的黃大仙，則是葛洪的弟子，亦在羅浮山得道。鮑姑、呂洞賓、何仙姑、鐵拐李等神仙都曾在羅浮山留過勝跡。羅浮山道教文化深厚，流傳著眾多道教故事。

在羅浮山，葛洪完成了採藥治病、煉丹、著書這人生三件大事。相傳葛洪年輕時以博學聞名，文韜武略兼備，曾在朝廷任職將軍，然而他不好高官厚祿，獨好神仙導養之法，四十八歲時與其妻鮑姑隱居羅浮山中，建起茅庵，採集草藥，著書立說，煉丹修道，濟世救人，深受羅浮山一帶民眾愛戴，他在山上總結煉丹經驗，撰寫的《抱朴子·內篇》，確定了中國的神仙理論體系，同時也豐富了道教的思想內容。葛洪羽化登仙的故事充滿神話色彩。一天，葛洪稱他將要到很遠的地方尋找師父，及後，他沐浴熏香，衣冠整潔走出庵門，手持寶劍，口誦經文，登仙而去，百姓得知葛洪仙逝，紛紛到來悼念，只見葛洪遺留的袍袍，霎時化成碎片，變成許多大大小小色彩斑斕的蝴蝶盤旋而起，聚於一個天然石洞中，這便是現時羅浮山上的景點「蝴蝶洞」。

由葛洪創建的沖虛觀、黃龍觀、九天觀、酥醪觀等道觀，均是現時羅浮山上的名勝，當中的沖虛觀，為香港黃大仙的祖庭。傳說黃大仙會跟隨葛洪在羅浮山修道，葛洪仙逝後，黃大仙服用了葛洪留給他的仙丹，但因功力不足，未能升天，而成了一個長生不老的「地仙」，逍遙人間，救苦救難。如今，「有求必應黃大仙」一說被廣為傳頌，黃大仙祠更遍布嶺南地區和東南亞各地。

據說，一九二五年，蔣介石曾到羅浮山休息和拜神，他到了酥醪觀，跟該觀道長談了一整晚，最後抽了一支籤，道長解道「勝不離川，敗不離台。」蔣介石希望道長能具體解釋，道長只說：「天機不可泄露。」現在看來，籤文意思很明白。

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青松觀道長侯寶恒在羅浮山投資重建了黃龍觀，傳說黃龍觀舉行開光慶典時，天邊有兩條帶狀白雲，宛如游龍在天邊飛舞，約十分鐘才隱隱散去，成千來賓嘖嘖稱奇。侯寶恒道長栽培了二十多名香客，至今堅守黃龍觀，傳播道教文化。黃龍觀一直以來香火鼎盛。

羅浮山空氣清新，道教養生文化歷史悠久，居民長壽者眾多。今年六月羅浮山管委會統計發現，羅浮山地區八十歲以上的長壽人口多達二千八百九十三人，其中百歲老人有十四名，長壽老人比例遠遠超過聯合國「長壽之鄉」的標準。

古代學者對於孔子的言說，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除了漢代王充在《論衡·問孔》中說的那一番強調「難問」（即「問難」）之合理性的話，就要數明代李贄的《題孔子像於芝佛院》了。此文是正話反說，意圖卻是明白的：自漢以來，都把孔子當做「大聖」，並非因為真正懂得孔子，只是「從來」心理使然，「萬口一詞」，大家都這麼說；「千年一律」，歷來都這麼說。因此失去了自己耳目之功能。文章最後說：「余何人也，敢謂有目者於芝佛之院。既從眾而聖之，亦從眾而事之，是故吾從眾事孔子於芝佛之院。」李贄說的是史上「尊孔」的最大弊端，大多數「尊孔」者只是「從眾」而已，並不真正識孔，不但具有極大的盲目性，也不排斥對於歷代權勢者之正統觀念帶有極大的迎合性，他們在幫助權勢者們將孔子抬上神壇的同時，也與權勢者們一起，將孔子帶入了絕境。

上個世紀的前期與後期，都有過批孔的浪潮。兩次批孔，性質迥異，不可同日而語。五四時期的批孔，乃是對兩千餘年來在權勢者們操控下盲目尊孔的一種反動。這種批孔，其實是以識孔作為基石的，在批之中，雖有偏激之詞，卻也不乏真知灼見。在批之，在魯迅眼中就有兩個孔，一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孔子，一個則是有肉也有骨有七情六欲的原生態的孔子。他批的主要是那個被權勢者們捧起來的孔子，對於原生態的孔子，並不全盤否定一概排斥，對其思想資源還有所汲取。

此全然不同，參加這場與批林連在一起的批孔運動的，沒有幾個抱有真正識孔的意願，大多都是奉命批孔，從眾批孔，套用李贄的話，叫做「既從眾而批之，亦從眾而妖之」，這種「批孔」與「獨尊儒術」之「尊孔」似乎水火不容，在思想方法上，卻是異曲同工，殊途同歸。例如，無語是王充，還是李贄，以及荀子、王安石、直至章太炎，在對孔子及儒家文化之被戴上與孔子以及儒家對立的「法家」之桂冠。恰恰從另一角度體現了當時人們對孔子及其儒學缺乏最起碼的認識。

「批孔」之得失應當使人明白，「尊孔」也好，「批孔」也罷，都立足於「識孔」。只有弄懂孔子及其儒學到底是怎麼回事，方能尊其所當尊，批其所當批。孔子作為歷史文化名人，有其人格魅力，也有其人性弱點。孔子對中國兩千多年歷史之影響，有負其人之名。所以，對於孔子及其儒學，有尊有批，有真之真，有偽之偽，都是不可取的。既得一錢不值，都是不可取的。

如今的一國學熱，其核心乃是孔子熱。祭孔規格不斷升級，尊孔調門日見高漲，不但有人提出中國必須「回到儒家去」，而且也有人說，中國今後二千年的思想學術、文化創新，也得在孔子傳授的「六經」指導下進行。如此「尊孔」，竊以為並不可取。「歷史真像古老自鳴鐘的單調，向左擺過去多少度，向右也得擺多少度」，這就是說，無論過去多少度，胸無定識，方才容易左右搖擺，好走極端。

哀「批判性思維」

劉吉同

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兩院一院」大會的報告中，倡導大家要有批判性思維，說它是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精神狀態，是一種獨立思考「精神」。話雖然是對自然科學家講的，但卻具有普遍意義。什麼獨立思考性思維，以為其精髓就是質疑和辯析，不能人云亦云。然而，它在現實中的處境可謂悲乎哀哉。

掩蓋真相的最恨它。報道新聞也好，研究歷史也罷，「宜細不宜粗」，其全部目的就為了逼近真相，揭示真相。這就必然要高舉批判性思維的大旗。汪洋說：「我們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此語一出，很多人感覺石破天驚。其實，汪洋只是說了個大話而已。人民是執政黨的衣食父母，這是天下常識。之所以今天有石破天驚之感，關鍵是長期以來的極「左」宣傳和愚化教育所致。如今，需要用批判性思維對待的東西太多了，民主不需要「特色」，市場不分姓社姓資，愛國是否就是一直投資成票，世界有沒有普世價值……真是難題。

批判性思維是到達真理彼岸的橋和船，是通向真相的曲折的路。它擁抱的是光明，追奔的是公平。它以社會批判為己任，企圖讓一切假惡醜的東西暴露於天日之下，又企圖讓真善美的金光在人間熠熠生輝。批判性思維是有立場的，在雞蛋和石頭之間，它選擇的永遠是雞蛋。故而權勢、「家長制」、「一言堂」、壟斷者、特權集團、達官貴人、專制獨裁者，視為大敵。原因很簡單，因為批判思維的最終結果，會剝去他們身上的畫皮，攪動他們貪腐和掠奪的根基，最終掀翻他們長期享受的「肉肉宴席」。因此，那些權傾一時的「土皇帝」，最恨批判性思維。僵化的體制恨它，強勢恨它，特權恨它，豈止是恨，而是要扼殺它。人人都懂批判性思維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十分重要，但真要讓它在現實中揚眉吐氣，如魚得水，恐怕要打掉無數「攔路虎」才行，非一場革命式的變革不可。

黃大仙祖庭羅浮山

方元

位於廣東惠州博羅縣的羅浮山，是中國道教名山。廣東惠州博羅縣縣長江菊蓮近日表示，該縣已啟動道家名山羅浮山的葛洪文化申遺工作，羅浮山目前已成為珠三角地區的旅遊熱點，資料顯示，去年有逾七萬港澳僑胞和遊客到黃大仙祖庭所在地羅浮山參拜及遊覽。

羅浮山是道教十大洞天之第七洞天，七十二福地之第三十四福地，擁有九觀十八寺二十八庵，四百三十二座大小峰巒，九百八十多處飛瀑流泉，七十二個石洞山房。羅浮山得名頗為傳奇，相傳古時只有羅山，後浮山從東海浮來，以鐵橋峰與羅山相連。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東晉道教學者、著名煉丹家、醫學家葛洪就曾在羅浮山上煉丹修道，而在香港廣為人知的黃大仙，則是葛洪的弟子，亦在羅浮山得道。鮑姑、呂洞賓、何仙姑、鐵拐李等神仙都曾在羅浮山留過勝跡。羅浮山道教文化深厚，流傳著眾多道教故事。

在羅浮山，葛洪完成了採藥治病、煉丹、著書這人生三件大事。相傳葛洪年輕時以博學聞名，文韜武略兼備，曾在朝廷任職將軍，然而他不好高官厚祿，獨好神仙導養之法，四十八歲時與其妻鮑姑隱居羅浮山中，建起茅庵，採集草藥，著書立說，煉丹修道，濟世救人，深受羅浮山一帶民眾愛戴，他在山上總結煉丹經驗，撰寫的《抱朴子·內篇》，確定了中國的神仙理論體系，同時也豐富了道教的思想內容。葛洪羽化登仙的故事充滿神話色彩。一天，葛洪稱他將要到很遠的地方尋找師父，及後，他沐浴熏香，衣冠整潔走出庵門，手持寶劍，口誦經文，登仙而去，百姓得知葛洪仙逝，紛紛到來悼念，只見葛洪遺留的袍袍，霎時化成碎片，變成許多大大小小色彩斑斕的蝴蝶盤旋而起，聚於一個天然石洞中，這便是現時羅浮山上的景點「蝴蝶洞」。

由葛洪創建的沖虛觀、黃龍觀、九天觀、酥醪觀等道觀，均是現時羅浮山上的名勝，當中的沖虛觀，為香港黃大仙的祖庭。傳說黃大仙會跟隨葛洪在羅浮山修道，葛洪仙逝後，黃大仙服用了葛洪留給他的仙丹，但因功力不足，未能升天，而成了一個長生不老的「地仙」，逍遙人間，救苦救難。如今，「有求必應黃大仙」一說被廣為傳頌，黃大仙祠更遍布嶺南地區和東南亞各地。

據說，一九二五年，蔣介石曾到羅浮山休息和拜神，他到了酥醪觀，跟該觀道長談了一整晚，最後抽了一支籤，道長解道「勝不離川，敗不離台。」蔣介石希望道長能具體解釋，道長只說：「天機不可泄露。」現在看來，籤文意思很明白。

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青松觀道長侯寶恒在羅浮山投資重建了黃龍觀，傳說黃龍觀舉行開光慶典時，天邊有兩條帶狀白雲，宛如游龍在天邊飛舞，約十分鐘才隱隱散去，成千來賓嘖嘖稱奇。侯寶恒道長栽培了二十多名香客，至今堅守黃龍觀，傳播道教文化。黃龍觀一直以來香火鼎盛。

羅浮山空氣清新，道教養生文化歷史悠久，居民長壽者眾多。今年六月羅浮山管委會統計發現，羅浮山地區八十歲以上的長壽人口多達二千八百九十三人，其中百歲老人有十四名，長壽老人比例遠遠超過聯合國「長壽之鄉」的標準。

古代學者對於孔子的言說，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除了漢代王充在《論衡·問孔》中說的那一番強調「難問」（即「問難」）之合理性的話，就要數明代李贄的《題孔子像於芝佛院》了。此文是正話反說，意圖卻是明白的：自漢以來，都把孔子當做「大聖」，並非因為真正懂得孔子，只是「從來」心理使然，「萬口一詞」，大家都這麼說；「千年一律」，歷來都這麼說。因此失去了自己耳目之功能。文章最後說：「余何人也，敢謂有目者於芝佛之院。既從眾而聖之，亦從眾而事之，是故吾從眾事孔子於芝佛之院。」李贄說的是史上「尊孔」的最大弊端，大多數「尊孔」者只是「從眾」而已，並不真正識孔，不但具有極大的盲目性，也不排斥對於歷代權勢者之正統觀念帶有極大的迎合性，他們在幫助權勢者們將孔子抬上神壇的同時，也與權勢者們一起，將孔子帶入了絕境。

上個世紀的前期與後期，都有過批孔的浪潮。兩次批孔，性質迥異，不可同日而語。五四時期的批孔，乃是對兩千餘年來在權勢者們操控下盲目尊孔的一種反動。這種批孔，其實是以識孔作為基石的，在批之中，雖有偏激之詞，卻也不乏真知灼見。在批之，在魯迅眼中就有兩個孔，一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孔子，一個則是有肉也有骨有七情六欲的原生態的孔子。他批的主要是那個被權勢者們捧起來的孔子，對於原生態的孔子，並不全盤否定一概排斥，對其思想資源還有所汲取。

此全然不同，參加這場與批林連在一起的批孔運動的，沒有幾個抱有真正識孔的意願，大多都是奉命批孔，從眾批孔，套用李贄的話，叫做「既從眾而批之，亦從眾而妖之」，這種「批孔」與「獨尊儒術」之「尊孔」似乎水火不容，在思想方法上，卻是異曲同工，殊途同歸。例如，無語是王充，還是李贄，以及荀子、王安石、直至章太炎，在對孔子及儒家文化之被戴上與孔子以及儒家對立的「法家」之桂冠。恰恰從另一角度體現了當時人們對孔子及其儒學缺乏最起碼的認識。

「批孔」之得失應當使人明白，「尊孔」也好，「批孔」也罷，都立足於「識孔」。只有弄懂孔子及其儒學到底是怎麼回事，方能尊其所當尊，批其所當批。孔子作為歷史文化名人，有其人格魅力，也有其人性弱點。孔子對中國兩千多年歷史之影響，有負其人之名。所以，對於孔子及其儒學，有尊有批，有真之真，有偽之偽，都是不可取的。既得一錢不值，都是不可取的。

如今的一國學熱，其核心乃是孔子熱。祭孔規格不斷升級，尊孔調門日見高漲，不但有人提出中國必須「回到儒家去」，而且也有人說，中國今後二千年的思想學術、文化創新，也得在孔子傳授的「六經」指導下進行。如此「尊孔」，竊以為並不可取。「歷史真像古老自鳴鐘的單調，向左擺過去多少度，向右也得擺多少度」，這就是說，無論過去多少度，胸無定識，方才容易左右搖擺，好走極端。